

流寓策略中的家族、同乡和身份团体联系^{*}

——1230—1330 年间蒙古人入川和四川精英的流徙

保罗·J·史密斯(Paul J. Smith)
(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教授)

历史学家已经确定了 10 到 12 世纪中国人进入精英阶层和促进家族兴隆的两种基本策略。第一种是以谋求官职和参与国家政治为中心——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各种官职、培养儿子做官和与其他官员结交。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和何炳棣、张仲礼分别确定北宋和明清官僚阶层的精英采用了这种策略;第二种则以地方权力为中心——增加家族的财富和田产、建立与同乡的联系、让儿子从事各种职业,当然,一旦有机会则接受各种官职,不过主要还是扩大自己在地方的权力基础。这种模式由南宋文人袁采提出,并被韩明士(Robert Hymes)称之为“地方主义策略”(localist strategy)。^①

*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提供的、在四川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基金赞助。我在此特别感谢该院的主人贾大泉教授、我的朋友和同事陈世松教授。本文的初稿在 1990 年芝加哥举行的 Haverford College Faculty Research Talks 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和 1990 年哥伦比亚大学传统中国研讨会上宣读。我非常感谢亚洲研究协会评审小组的贾志扬(John Chaffe)、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Elizabeth Endicott-West)、谢惠贤(Jennifer W. Jay)、刘元珠(Ruby Lam)、韩森(Valerie Hansen)、韩明士、Vasiliki Limberis 和宁爱莲(Ellen Neskar)对该文的批评和建议。

本文的许多信息来源于墓碑铭,文中注释的一些碑文名被缩写。

① 郝若贝在《750—1550 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变》(“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JAS 42.2, 1982: 365—442)中,详细描绘了 11 世纪官僚流动策略的产生以及它如何被更加多样的地方士绅政策所取代。有关何炳棣、张仲礼等人对明清时期精英阶层和精英流动策略的讨论,参看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和冉玫烁(Marry Backus Rankin)主编的《中国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24 页。韩明士在《官宦与乡绅: 两宋时期江西抚州精英研究》(Hymes Robert, *Statesman and Gentlema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和《宋元时期抚州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收集于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和屈顺天(James L. Watson)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族组织: (1000—1940 年)》(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95—136)中,对郝若贝关于两宋变化的流动策略模式作了详述。有关袁采的观点,参看伊沛霞《中国宋代的家庭和财产: 袁采的社会生活箴言》(*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a: Yu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伊沛霞在《中国宋代精英统治的变迁史》(“The Dynamics of Elite Domination in Sung China,”《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8 期第 2 卷(1988): 493—519 页)中对 6 部关于宋代精英的著作进行了回顾。

每种策略因国家的威信、官职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可靠性、地方商人机会的多少和政治气候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人们以一种近乎循环交替的方式优先选择某一种策略。我们从郝若贝和韩明士等人的著作中得知,“地方主义策略”在南宋似乎更有吸引力。精英家族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建立一个殷实的家底、加强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和为儿女缔结当地的婚姻中,而主要不是做官^①。元代的情况就没有这么清楚。韩明士的后续研究表明,“地方主义策略”在蒙古统治时期同样占支配地位^②。当然,鉴于存在元代南人做官的制度和道德障碍,精明的家族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地社群中。不过宋元之际的社会大动荡迫使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地方网络。对那些由于蒙古人到来而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财富和田产)的精英家族来说,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他们如何才能保持自己在精英阶层的地位?这些问题对流徙的精英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即使在已经有流寓精英的地区,那些采用地方主义策略的流徙家族在当地也并不十分受欢迎。没有田产、财富或地方关系的新移民很难突破当地精英社会的保护层。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难放弃地方主义策略,而专注于从元廷获得官职。牟复礼(Frederick Mote)和谢惠贤新近的研究揭示,汉人在元廷做官面临巨大的道德压力^③。尽管如此,许多汉人的确贪图新朝的官职,而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蒙古人对全国人口实行种族分化的政策下,人数众多的南方汉人被迫为少数指定的官职而竞争。在元朝前50年中,这些官职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而分配。韩明士的研究证明,这种情况使人们重新回到了重视地方关系的策略。换句话说,即使是采取官僚流动策略的人也要求有很好的地方关系^④。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障碍,流徙的精英能否克服贫困和缺乏地方关系等不利因素,使自己在新政权下重新成为新地方的精英呢?一项对流徙的四川文人的研究表明,有少数人能做到这一点。

在宋末元初两百万户从户籍记录中消失的家庭中,只有29户在家乡之外的

① 郝若贝:《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和社会的转变》,416—422页;韩明士:《官宦与乡绅:两宋时期江西抚州精英研究》,115—117页。

② 尽管许多婚姻让人想起北宋官僚联姻的方式,韩明士的结论是,新的制度环境要求新的战术,但总体的策略仍然没有变化。参看韩明士:《宋元时期抚州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106—113页。

③ 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 202—240页,见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儒家学说》(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谢惠贤(Jennifer W. Jay),《1276—1300年间元初的忠宋思想》(Song Loyalism unde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uan Rule, ca. 1276—1300),该文在1990年4月芝加哥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宣读。

④ 韩明士:《宋元时期抚州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107页。

地区重新兴盛,出现在元朝的户籍记录中。而这 29 户家庭都属于四川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都具有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并保持兴旺发达的特征。此外,他们往往好几代都在学术上有专长和成就,从而跻身士大夫这个身份团体(status group)。这些特征对他们跻身当地士绅阶层(gentry class)具有重要意义^①。尽管由于这些记录中保留的例子太少,并不能得出蒙古人入川后整个四川人口命运的准确结论,现有的信息确实告诉我们那些在一个地方被剥夺了财产和田产的精英家庭如何能够在一个新政权下重新跻身于另一个地方的精英阶层。

本文将揭示宋元之际流寓中的四川精英依靠三种联系,即以家族、籍贯和身份团体联系,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重新植根于中国东南地区精英阶层。身份团体(status group)联系,我指的是那些精英靠自己的技能和士大夫身份而受到的优待。在元代,家族和籍贯关系为流亡精英提供了安全庇护;在宋时获得的士大夫技能和关系则成为他们进入仕途和几代为官的钥匙。一旦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这些在家乡曾是地方士绅政策的模范实践者的流亡四川精英,不得不利用他们的身份团体联系使自己融入东南地区的士绅社会。

浩劫:蒙古人入川的破坏

在蒙古人进攻南宋时期,没有什么地方遭受的破坏比四川更彻底。从 1231 年到 1280 年,蒙古部队在进军南宋腹地的过程中系统地将四川化为废墟。在蒙古人入川前的一千多年中,自给自足的四川盆地就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天府”美誉,是中国文化和经济最活跃的中心^②。但是蒙古人的战争使“天府”沦为落后的

^① 为了确定某个人在多层次的社会等级中的位置,马克斯·韦伯将“对物品和技能以及……它们在某一经济秩序中带来收入的使用的相对控制”作为一种功能,来区分“阶级状况”(class situation);而“身份团体(有译地位团体)”(status group)是指那些在一个较大的团体中,以诸如生活方式、正规教育和世系或职位上的声望为标准,成功地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尊重的一大群人。参看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和社会:阐释性社会学纲要》(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302—307 页。阶级关注的是经济地位,而身份团体反映的是社会尊重。尽管阶级和地位可能会一致,但并不一定会这样。虽然从 12 世纪开始,从文人参与主流文化的意义来说,大多数士大夫很可能来自地方士绅阶层,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也来源于贵族、皇族、农民,甚至是商人精英。

^② 有关四川的经济史概览,参看保罗·J·史密斯(Paul J. Smith):《公元 2 世纪到 1948 年长江上游商业、农业和中心的形成》(Commerce, Agriculture, and Core Formation in the Upper Yangzi, 2 A. D. to 1948) (Late Imperial China 9.1 (1988): 1—78)

边疆。这些战争所造成的直接破坏是惊人的：在半个世纪中，大约两百万户人被屠杀或被迫逃亡。该地区的人口由1223年的2590092户下降为1282年的12万户到50万户^①。长期的影响同样非常深远，因为在此后四个世纪中，四川的生产力再没超过宋代的三分之一，人口密度也没有宋代大。甚至到了16世纪末，四川的户数仍不超过80万户，一直到两个世纪后才达到宋代水平^②。

蒙古人对四川发动的战争只不过是前代征服策略的翻版。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许多帝国王朝都试图通过插入四川盆地来征服中国的东南各省，先在这里获得人力和物力，然后通过长江的峡谷挥师东进。这一策略也被蒙古征服南宋的三个主要策划者窝阔台（在位时间1229—1241年）、蒙哥（1251—1259年）和忽必烈（1260—1294年）所采用。为了迫使南宋给蒙古人进攻金的战争让路，1231年蒙哥第一次派遣3万骑兵对蜀北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进攻。在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将注意力转向了南宋，并开始对四川实施一系列的闪电进攻。据说到1236年末，四川59个府治所除4个外全部被夷平。在此后的25年中，四川被无力顾及的朝廷所抛弃，独自承受蒙古进攻南宋的锋芒。1260年接管战争指挥权的忽必烈改变战略，将战争锋芒指向长江中游。但是，即便到了征服战后期，四川仍然不断遭受掠夺给养的蒙古军队袭击和不断增加的叛变汉人的袭扰。一直到南宋都城杭州投降一年后的1280年，四川才停止抵抗^③。

从进攻四川的战争开始到1260年，蒙古铁骑将杀戮作为威慑和统治的手段。从1260年开始，忽必烈朝中的汉人越来越多，他们才逐渐改变草原民族的传统^④。佚名的《昭忠录》保存了一段1236年时成都被毁灭的记录，当时人们还没有防守准备：

元兵既灭曹（有闻）兵，遂破阆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至怀安军金堂县，哨兵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识兵革，制司丁黼昏庸无谋……十八日巳时，哨至汉川牟池镇。铁骑三百，申时至成都城北驷马桥。城中忽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十通》），11. 117a《元史》（北京：中华书局编，1976）12. 247。元朝的数字有争议，最多是一个粗略估计。陈世松在他的《元代的四川》（未刊论文，1984）第10页中估计真实的数字大约在30到50万户之间。

② 参看保罗·J·史密斯《公元2世纪到1948年长江上游商业、农业和中心的形成》的各处。

③ 本段概述是依据胡昭曦《略论南宋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见邓广铭和程应镠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76—378页。也可参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年。

④ 有关蒙古人的战术，参看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The Rise of Chingh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0）32页。

闻有军至 疑是溃兵。元兵沿城至大东门,径当城。十九日,元兵往来城内,居民皆纵观。及晚,五巷内南角数人擒杀一骑,民间始知是元兵。市人或执挺与驰,或以几桌拦截街巷,元兵复出屯城外。二十日巳、午时,再入城,居民皆闭门,有举家身缢者,有举家自焚者。制司丁黼与甥王茶干、徐监仓遁,微服至南门,假道石笋观音院,哨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属俱遁,惟制司参议王翊及僚属二人召军民立赏格与共击北兵。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龟实伍盘中,按五方,五龟动不止。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住,不过二世;若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①

成都被毁时的死亡数字历来是所有战争史家的关注点之一。据《三卯录》记载,成都被焚后“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②作为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成都有140万人遇难是不难想象的,特别是这里的人口可能因为难民而猛增。《三卯录》还记录了朱禔孙这样一个例子。他是蒙古人杀戮中一位22岁的阆中幸存者:

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禔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禔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它所后出蜀。^③

一旦战争将平民社会的纽带拆散,每个平民都将遭受威胁。大约在1237年,四川御史吴昌裔(1183—1240)和其他四川显要官员一样接二连三地上疏,要求朝廷援助被进攻的四川。在其中的一份奏疏中,吴这样描绘蒙古人第一次从四面八方横扫四川后的情况:

又况虜所不到之地,悉遭江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处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然昔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

① 这段文字的基本来源是南宋忠烈传记集《昭忠录》中王翊的传记,收录于胡昭曦和唐唯目编辑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264—265页。有关的蒙古军队使用假冒旗帜的诡计,参看《丁黼传》,《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454、13345。蒙古流动屏护部队通常在主力部队前35到70英里范围侦察,有关内容参看亨利·D·马丁:《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中国北方》,29页。

② 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四部备要》)34.4b。

③ 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四部备要》)34.4b。

之野。^①

尽管有无数关于死亡和毁灭的故事可以印证,但元代文人袁桷 1320 年写的悼文就足以说明四川被毁给流徙中的四川精英的亲友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噫!蜀由秦帝入中夏至于宋,凡一千五百余年。文物大盛,绝不知有兵革,一旦扫削殆尽。迄今百余年,遗垆败棘,郡县降废几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②

流徙:家族和同乡的价值

蒙古战争中最突出的受害者是四川官僚精英。他们包括世代居住的本地人和在宋代成为全国显贵的唐末移民中的贵族^③。举例说明四川唐宋精英所遭受的毁灭:在费著 14 世纪中期所写的纪念 45 个士大夫家族的《成都)氏族谱》中,只有作者的家族得以保全在四川的地位,另外两个《氏族谱》上的家族——成都宇文氏(以宇文公凉为代表)和雍康张氏(以张翌为代表)能够追溯到元朝^④。此外,还有更多的轶话资料哀悼精英阶层门第的离散,从眉州苏氏的后代到广安的安氏家族^⑤。尽管证据并不充分,但看起来四川唐宋精英门第的确大部分或者被消灭,或者湮没为平民百姓。但是,少数精英家族的确逃过劫难,重新跻身于四川之外的精英社会中。对《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参考书目的系统调查的结果是,

①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1943 年影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 年)84. 18a。被胡昭曦《略论南宋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引用,见 375 页。其他当时正在都城或都城附近的上疏的四川人包括牟子才(?—1265)、魏了翁(1178—1237)、度正(1190 年进士)和李鸣复(1209 年进士)。他们的请愿书选编在《宋代蜀文辑存》中。

② 袁桷《清容居士集》34. 4b。

③ 我在《征税天府之国:1072—1224 年间官僚商人和四川茶马贸易》(*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Bureaucratic Entrepreneurship and Sichuan Tea and Horse Trade, 1072—122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第 77—108 页中溯源四川精英从“土豪、形势户”转化为“官户或士大夫”。

④ 费著《氏族谱》,见《全蜀艺文志》(1889 年,雨余山房编)54. 1b—3a, 55. 3b, 55. 7b—8b。有关费著的资料,见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年,1444 页。在元代四川能够找到的其他宋代精英家族的子孙包括魏了翁的后代魏奎和文彦博的后代文如玉(1267—1342),以及眉州苏氏的资阳一房的成员。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2078 页;虞集,《题史秉文资阳故谱序》,见《道园学古录》,台北:国学基本丛书,1955—1959 年 5. 95;宋褫,《奉元路总管致仕文公神道碑》,见《燕石集》(四库全书),14. 28a—31a。对当地地名辞典和《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的调查,得到元代四川大约有一百名幸存者,他们大多数在元代的记录中只是非常短暂地出现过。

⑤ 戴表元《题蜀苏氏族谱后》,见《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丛刊),18. 16b—17li;《广安州新志》(1911 年),11. 2b—3a。

在可能多达几千的流寓精英中,29个流徙的精英家族将他们的声望一直保持到元代。毫无疑问,平民百姓也有逃过劫难的,但他们的故事没有被史料记录下来。

表1确定了29个家族。每个家族由它最有声望的成员代表。通常这个人在元代获得的成功使他有墓碑铭。熟悉四川历史的人将认出其中一些当地最有名望的门第:29个家族中至少有8个是唐代因为做官或侍臣进入四川的^①;至少13个在唐朝或宋朝有明确的做官历史^②;他们中的四家——杨氏、游氏、虞氏和成都张氏在宋代做过宰辅^③。在四川,这些家族构成了一个地方网络。他们一起学习和做官,儿女之间互相通婚^④。

蒙古发动进攻后,地位和名望并不能使人免于灾祸。重庆进士胡天启在1246年试图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带出四川。他的例子正好说明逃避蒙古军队有多么困难:

当北兵(蒙古兵)到达重庆,天启带着母亲逃亡。蒙古兵威胁杀死他母亲,天启的妻子张氏哭着哀求为她替死。蒙古兵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杀死了天启的母亲。天启和他的妻子哭天抢地,痛斥蒙古兵。蒙古兵的头目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想赦免他们俩,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跟着我,将享尽荣华富贵。”但是,夫妇两人对他骂得更厉害,最后都被杀。听说这件事的人都称赞

① 唐代的家族包括张惠的家族(《元史》,167. 3923—3924);眉州的杨氏、史氏和刘氏(彭寿);仁寿的虞氏和牟氏;绵州邓氏,成都宇文氏和资州黄氏。

② 黄泽、林宽、刘彭寿、刘宗说、牟应龙、史光、谢昌元、杨壮行(眉州杨氏)、游崇(音译 Chong)、虞集和虞槃、宇文公凉、张惠和张翌(他父亲做县主簿这样的小官)的家族做官有史可查。

③ 这些宰辅是杨栋(1229年进士)、游似(?—1252)、虞允文(1110—1174)和张商英(1043—1122)。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 例如,牟应龙的父亲娶了邻近的并研县李心传的外孙女邓氏为妻。应龙的发妻是眉州的一位姓杨的,第二个妻子则是来自眉州苏轼母亲出生的家族中一位程姓女子。根据虞集的说法,两个妻子都来自非常有名望的文人家族。通过母亲的关系,应龙与四川重要的历史文献传统联系起来,而他和眉州程氏的婚姻又将他和史氏及虞氏联系起来。参看虞集的《牟伯成墓碑》(《道园学古录》,15. 260—262)。四川西部的精英同族通婚非常典型;他们跨县或跨地形界线(仁寿和眉州之间的一条河)的婚姻与韩明士所确定的江西抚州地区更加地域化的婚姻形成对照。四川人还喜欢表亲通婚。遂宁谢端的母亲和祖母都姓牟,参看苏天爵《谢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台湾“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3. 503)。张翌的母亲和第二个妻子都姓黎,参看吴澄《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吴文正集》,四库全书,73. 13b, 15b)。虞槃娶了他的表妹谭氏,由于既跨县又是表亲,这桩婚姻多少有些不同寻常,参看韩明士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Hymes, Marriage, Descent Groups, and the Localist Strategy),第111—112页。不过,这样的婚姻在大离散之前在四川非常典型。参看虞集《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A3. 724—727。

和同情他们。^①

在四川,没有几个人能比最著名的逃亡故事的主人公程夫人和她的儿子史光(1226—约1300)的祖上更有名。根据元代的名人虞集(1272—1348)(他曾为许多四川老乡写过传记)的说法,“眉州史氏,由吏部侍郎俨从僖宗幸蜀,因家眉州(880)……族大多显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②但是,祖上的名气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蒙古人进攻的暴行:

(程夫人)夫死子幼,夫人守节,自誓以抚育其孤。会国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夫人亦将携其孤,依邻人家翁走东南,取黄金囊而系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窞身伏林间,惧伏者,兵尽驱以出,列坐地上,拟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杀。”有邻妪者先免,过夫人,勉夫人速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暂不死耳,吾儿无资以逃,终必皆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归,幸语吾儿,来求尸。”求金兵纵夫人求金,夫人辞无金,遂见杀。妪求孤儿告之。明日掠者退,邻人父老,以其孤舆榱求得之,即殓以瘞。偶值善画者,为象其容貌而题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难,年五十四。”遂负之而东,至湖州止焉。光时年十三耳,今湖州史氏自光始云。^③

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眉州史氏的其他成员都成功地逃到了苏州和长沙,而程夫人却没有得到她丈夫所在家族的帮助^④。史氏家族对孤寡的遗弃可能仅仅反映了在蒙古人入川初期,保护性联盟形成之前的一种混乱状态。我们有这方面的证据,大多数逃亡者确实得到他们亲属的帮助。在有些例子中,整族的大部分人往往一起逃亡:1236年,文如玉的“合族避天兵南下”,只有他父亲例外。在那里他们从文献上消失^⑤;再晚些时候,谢端的家族投奔“避兵出蜀,居江陵至公始家武昌”的一房^⑥。大多数的四川人是以由核心家庭、兄弟和连襟组成的更小家庭单

① 《重庆府志》(1606) 50. 2b。如果这个故事是准确的话,很可能蒙古人打算将胡天启和他的妻子据为人质或奴隶,而将那些价值较小的老年妇人杀死。蒙古人将相当数量的四川人直接据为奴隶,而不是将他们当成人质换取赎金。在1250年,有这样的记录“岐雍(陕西的长安西部)民家奴皆蜀俘”,姚燧《武略将军知宏州程公神道碑》,《牧庵集》(丛书集成) 24. 300。(本段引文为英文的译文——译者注)

② 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道园学古录》 20. 337。

③ 《道园学古录》 20. 338。

④ 虞集《题史秉文》,《道园学古录》, 5. 95。

⑤ 宋駿《文公神道碑》,《燕石集》, 14. 28a。

⑥ 苏天爵(英文原文为 Su Tianshun,可能为作者笔误——译者注):《谢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 13. 502—503;《元史》, 182. 4206—4207。



位逃亡。例如,1275年,王氏兄弟,现在只能确定为“蜀人”的两位学者,成功地逃到了慈利州(湖南)。另一位姓王的叫王元明的跟随父亲从成都逃出来投奔了他们^①。

表1 四川流亡社区

| 姓名 | 在世时间 | 四川原籍 | 目的地 |
|------|-------------|------|-----------|
| 陈吉甫 | 卒约 1300 | 梓潼 | 陕西 兴元 |
| 邓文原 | 1259—1328 | 绵州 | 浙江 杭州 |
| 杜敏 | fl. 1338 | 嘉定 | 湖北 公安县 |
| 何德之 | fl. 1250 | 成都 | 陕西 兴元 |
| 何坤章 | fl. 1250 | 临邛 | 陕西 兴元 |
| 黄泽 | 1259—1346 | 资州 | 江西 九江 |
| 李德成 | 宋末 | 绵州 | 湖南 澧县 |
| 林宽 | 1281—1319 | 资州 | 浙江 温州到湖州 |
| 刘彭寿 | 1273—1336 | 眉州 | 湖南 衡阳到衡山 |
| 父:刘渊 | fl. 1300 | | |
| 刘宗说 | 1268—1336 | 成都 | 湖南 长沙 |
| 牟应龙 | 1247—1324 | 仁寿县 | 江苏 湖州 |
| 蒲道源 | 1260—1336 | 眉州 | 陕西 兴元 |
| 青阳梦炎 | 宋元 | 成都 | 江苏 京口(丹徒) |
| 师世美 | 1253—1298 | 眉州 | 江苏 抚州 崇仁县 |
| 史光 | 1266—约 1300 | 眉州 | 浙江 湖州 |
| 史孝祥 | fl. 1300 | 眉州 | 江苏 苏州 |
| 史绳武 | fl. 1300 | 眉州 | 湖南 长沙 |
| 田公著 | 宋元 | 成都? | 湖南 慈利州 |
| 王兄弟 | 宋元 | 成都? | 湖南 慈利州 |
| 王立中 | 1309—1385 | 阆州 | 浙江 绍兴 |

① 虞集《慈利州天门书院集》,《道园学古录》,9. 167;《四川通志》(1816),145. 4a。

| 姓名 | 在世时间 | 四川原籍 | 目的地 |
|------|-----------|------|-----------|
| 王元明 | 宋元 | 成都 | 湖南 慈利州 |
| 谢昌元 | 宋元 | 资州 | 浙江 鄞县 |
| 谢端 | 1278—1340 | 遂宁 | 湖北 江陵到武昌 |
| 杨壮行 | 1268—1338 | 眉州 | 江西 庐陵 |
| 游汶 | 宋元 | 南充 | 浙江 德清 |
| 虞汲 | 卒 1318 | 仁寿县 | 江西 抚州 崇仁县 |
| 儿:虞集 | 1272—1348 | | |
| 儿:虞槃 | 1274—1327 | | |
| 宇文公凉 | 1333 进士 | 成都 | 浙江 湖州 |
| 张惠 | 1223—1285 | 成都 | 蒙古朝廷 |
| 张翌 | 1236—1302 | 雍康 | 江左 即东南地区 |

姻亲关系可能对帮助逃亡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236 年左右,雍康大姓的后代张翌的父亲因“蜀有兵难……从其外舅监承黎公出蜀寓浙”^①。虞集的家族逃离四川和定居东南主要依靠都是姻亲关系。虞家移居的故事始于虞集的曾祖父虞刚简。虞刚简曾在四川有过堪作楷模的仕宦生涯。此后,他和友人魏了翁、李心传(1167—1244)和范中黼东行传播程朱理学^②。他的儿子开离开四川到广东做了两任州官;任职期满后,却再也无法返回,因为四川这时已经遭到了持续进攻。于是他前往江西抚州的崇仁县,因为他的妹妹和同是四川人的妹夫陈元晋(1211 年进士)已经移居那里。他的妹夫将开安顿在县城外的一处房屋里^③。可是,开的儿子虞汲,也就是虞集和虞槃的父亲却仍滞留在四川。直到大约 1270 年,岳父杨文仲带着女儿和女婿前往湖南湘江流域的衡州赴任时,虞汲才得以离开四川。虞汲依靠岳父和其他杨姓成员(特别是长沙一房)的接济,直到 1287 年

① 吴澄《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碑铭》,《吴文正集》,73. 13b。

② 《元史》,181. 4174。

③ 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四部丛刊)9. 24b。陈元晋在昌彼得等人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74—1976)第 2548 页中被称为从四川迁出的移民。但是,韩明士根据科举名录和碑帖资料认为,陈元晋是崇仁的长期居民,而不是刚从四川来的移民;个人交流。

才带着一家人来到崇仁他父亲和叔父的住处^①。

正如虞开和杨文仲的例子所表明的,1236年后在四川境外做官的人通常不愿意或不能够返乡。像魏了翁、牟子才和杨文仲的堂兄弟杨栋这样的高官在都城(杭州)和南方的其他大城市定居^②;少数官员则在他们最后就任的地方建立新家。资州的难民黄泽的父亲“随兄骥子官九江,蜀乱不复能归。因留家九江,而贫日甚矣”^③。同样,刘宗说的家落在湖南,因为他的祖父宋末时曾在那里做过官^④。总之,在(统计的)29个家族中至少有9个利用做官逃出四川。这9个家族包括林宽、游汶、谢昌元和青阳梦炎,以及黄氏、刘氏、牟氏和虞氏家族。

家族是人们逃出四川的最重要的单位,而且在帮助家人逃亡方面没有比这更大的组织机构存在。我们在资料中既找不到整村人从四川集体逃亡的证据,也找不到类似“地下铁路”这样的渠道沿着长江输送难民,通过峡谷到达安全地区的证据,也不存在清初那样帮助移民流向四川的“会馆”网络。不过,的确出现过专门帮助逃亡四川人的机构^⑤。据方志记载,宋将孟珙(1195—1246)驻扎在江陵时,在临终前的1246年建立了一个书院,目的是“建书院以处流寓之士。每日见客虽数百人,一一接谈”^⑥。

由于缺乏可以辨别的支持组织,四川难民在前往东南地区时依靠籍贯联系、同乡(landsmann)意识来取得帮助。早期的移民和职位较高的宋官员正好为那些多数都是两手空空地逃出四川的难民提供帮助。这些流徙中的难民的最慷慨的保护者之一就是眉州杨氏的庐陵一房。杨栋1262年曾做过宰辅。作为他的后人和杭州家产的受益人,庐陵杨氏继承了巨大的财富和声望。南宋灭亡后不久,杨栋的外甥杨公畿接受了元朝江西南部的赣江源头上的南安路总管兼府尹的官职。

① 参看《元史》181,《圭斋集》9,和虞集为他弟弟写的墓志铭《亡弟嘉鱼大夫》,《道园学古录》43,724—727。文中我将虞集(Yu Ji)的父亲的名字拼写为“Yu Jii”以区分同音字。

② 《宋史》437,12965—12971(魏了翁的传记);《宋史》411,12355—12361(牟子才传记);《宋史》421,12585—12587(杨栋传记)。大约在这个时候,以牟子才为首的四川官员开始在南方的主要城市宣传对梓潼的崇拜,部分原因是请求梓潼帮助将蒙古人从四川驱除出去。参看韩森《变迁之神》(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144页;特里·克利曼《文昌和毒蛇:一个中国民族神的创世》(Terry Kleeman, “Wenchang and the Viper: The Creation of a Chinese National Go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1988年)第70—86页。

③ 赵汭《黄楚望先生行状》,《东山存稿》(四库全书)7,5b。

④ 欧阳玄《刘公墓碑铭》,《圭斋集》,10,1。

⑤ 何炳棣《长江中下游各省会馆的地理分布》“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hui-kuan (Landsmann-shaften) in Central and Upper Yangtze Provinces,”CHHP, 2nd series, 5, 2(1966): 120—152。

⑥ 《荆州府志》(1880年)78, 31a。

任职期满后杨公畿显然回到了杭州,但是到了暮年他将所有的田地分给了家族成员,然后移居位于南安下游的庐陵(今吉安市)^①。

虞集是杨家的亲戚和传记的作者。他记录了杨公畿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在庐陵战略性的位置帮助逃亡的四川人:

蜀人士大夫在故乡时,深苦兵寇之祸,故在东南者皆走岭海。及知世祖皇帝神武不杀,稍稍比还,而家业狼狈仅保性命。凡道出度岭者,南安公必出私财以周济之,得不至颠沛。其甚不能自存者,有全室养于杨氏者矣。^②

同样,慈利州的田氏也属于早期的移民。他们也利用自己在新的故乡所获得的财富和关系帮助那些后来的移民。慈利位于湖南西北部,处在分隔湖南和四川盆地的武陵山的东缘,隐没于澧水河谷,对四川难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避难所。虞集也认为,它是一个宜人的地方,既适合作物生长又有利于教化:“慈利之为州,远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见外事故为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于从善。”^③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举出证据说,宋末元初,慈利周围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少,他将这个现象归因为大地主的扩张^④。即便如此,慈利的社会政治结构仍具有足够的可渗透性来接纳像王元明这样的有相当才能的移民。王元明和父亲一起在宋末从成都流亡到慈利,并很快在他的新家取得了财富和地位。在14世纪初,他已经出现在当地抗洪和救火赈灾的最前列,其中包括向大约在1302年大水中救人的勇士提供许多赏金^⑤。慈利州也欢迎田氏。他们在宋亡之前从四川移居这里,已经好几代,是军事专家并对学问有偏好^⑥。据虞集记载,田公著的父亲利用几代积攒的财富资助从四川逃亡而来、没有任何资源而只有学问的王氏兄弟:

① 虞集《杨君墓志铭》,《道园学古录》43. 730—732。

② 《道园学古录》43. 731。

③ 虞集《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学记》,《道园学古录》35. 589。

④ 万志英《千流万壑之国:1000—1250年中国西南边陲的地理、移民和开化》(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Geography,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1000—1250*) (耶鲁大学博士论文,1983年),第382页。

⑤ 《四川通志》145. 4a。王元明的地位和对公众的热心为他赢得了不少职位:他被任命为州学副提举,后来又被荐为岳阳教谕(湖南长沙以北的湘阴县),最后被任命为澧州儒学教授。

⑥ 有关田荣孙(来自一个武学世家)和田公著的事迹,参看虞集《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庙记》,《道园学古录》36. 612—613;和《慈利州天门书院记》,《道园学古录》9. 167—168。两人都是四川人。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家族。14世纪初,田荣孙负责为了保佑黎民幸福的三皇庙的重建工作。庙的重建花费了五千缗,可能都是田荣孙自己提供的。

王某兄弟亦蜀人也,避地至焉。开门授徒以自给。公著之父率其子弟,往受教从之,乐闻其说。请结屋以容师弟子,与其乡人共有闻焉。王氏善之,而未敢自遂也。大德癸卯,慈利改作州学。更为大成殿正配神位及十哲象,而旧象无所于寓。王某谓公著曰:“子欲成父之志,此非其几乎?”乃请于官,欲筑宫以奉旧象而祠之。部使者深伟之……俨然学官之体备焉,提学官以闻于朝,名之曰“天门书院”,王氏、田氏与其乡之士民舍采于先圣先师以落成。^①

虞集对此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佛老”不但消耗人民的资源,而且戕害他们的心灵,书院通过宣扬理学传统可以起到抗衡“佛老”的作用。虞集对慈利州生活的“小插图”式的描述记录了汉族特别是理学价值观,在面对外族征服时如何生存和复兴;也为人们了解那些通过互助在慈利重新聚集起来的四川人的小社区打开了一扇小窗户。而在汉江上游河谷和跨越崇山峻岭、连接北方和四川的栈道相交所形成的十字路口,一个类似的社区也在四川以北的汉中盆地的兴元形成。与他们大多数同乡不同,退往汉中的四川人不是通过躲避蒙古人,而是通过为他们服务来换取保护,挽救自己。

1236年,蒙古人征服汉中。一年后,女真人瓜尔佳建议将该地区作为征服四川的经济上安全的基地。瓜尔佳亲自监督它的修缮工作,包括重建城墙和护城河、改造稻田和灌溉系统、新建的“官舍居第皆高”(于旧朝)。瓜尔佳的传记作者姚燧(1238—1313)对这些工作的成效作了描述:“其土豪……皆割裂自霸。昔为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据所郡县,宋边骁毅之将……亦挺身归公。”^②四川文人,大多数是当地的士大夫,很快都效仿。大约1253年,当地的梓潼学者陈吉甫投靠枢密院副使李德辉。李是北方汉人,负责四川—汉中这条轴线的军事。李任命陈为兴元文学掾——当时负责制定府衙所有礼仪文件的职务。根据他的学生和传记作者蒲道源的说法,“于是先生名益,振纪纲学事二十余年,教授生徒百余人。”^③同样,临邛人何坤章,父亲“信义为乡里所服”,也为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寻求安全而孤注一掷:“二十余随天兵北至兴元。时,有使赉诏收儒之在俘者。先生私集南冠之列当出者誓曰:‘吾党皆士族,此行如济则已。不济,宁赴江而死。安能为

① 《慈利州天门书院记》,《道园学古录》9, 167—168。

② 姚燧《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16, 204—205。参看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第41—43页。

③ 蒲道源《教授陈先生传》,《闲居丛稿》(台湾“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14, 585—586。有关李德辉参看《元史》163。

囚耶!’”他的这番故作的勇气得到了回报,因为他继续依靠自己的才智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以笔力之余助其思迟者,众皆赖之。土豪争以礼请为授居,止俾教子弟。”他的学识和声望使他得到了儒学正的官职。他的学生包括蒲道源,一个眉州难民家庭的15岁的儿子。作为一位很有前途的学者,蒲道源娶了何夫子的女儿^①。尽管蒲道源后来成为兴元四川难民中最有名的人和整个移民社区的传记作者,他和他的家庭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异常贫困。在他给自己妻子的碑文中这样写道,在他通过教私塾复兴家业之前,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有何氏堪称模范的持家^②。蒲道源在当地教书30年。当地官员不断地向朝廷推荐他。但是直到1313年,当他已经53岁时,他才最后接受了国史院编修官这样一个官职。此后的8年,他在翰林院任职。他在家度过了生命最后的16年,记录着兴元新精英的出现。而他和他的子女也正是其中的一员^③。1318年,蒲道源一个活下来的儿子考取进士,并在山西担任过几个地方官职。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以占领军军官身份来到兴元并在这里成家的家庭:大女儿嫁给了兴元的录事;二女儿嫁给了1260年被任命为兴元学校提举的山东人王德舆(原文如此,《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为王得舆——译者注)(1219—1292)的孙子^④;三女儿嫁给了杜彦礼,一位进士和甘州(Ganzhou)、凤田(Fengtian)提领(此处作者可能有误,杜彦礼所做各官中没有这个官职,而他的父亲做过洋州提领——译者注)。他是兴元一个山西文武世家的后代^⑤。

总之,我们在兴元看到了一个文人的边疆社会是如何形成,并且(在四川人中)对于那些有进取心、不受忠于前朝思想所束缚并愿意冒险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寻找安全的士大夫来说还是存在机遇的。在狭小的汉中盆地,这些四川的流亡人士要么当官,要么成为趋炎附势者与居住在当地的北方人融合。在这里他们一起在当地做官,互相通婚,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层社会核心。

认同:身份团体联系的力量

兴元的流寓士人概括了流徙社群的一个共同特点:利用在宋朝获得的学识取

① 蒲道源《梅隐何先生传》,《闲居丛稿》14. 581—584。

② 蒲道源《何氏宜人墓铭》,《闲居丛稿》25. 945—949。

③ 参看蒲道源的墓志,《顺斋先生墓志文》,《闲居丛稿》26. 1007—1010。

④ 参看《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96页;蒲道源《西轩王先生传》,《闲居丛稿》14. 577—580。

⑤ 蒲道源《提领杜君墓志铭》,《闲居丛稿》24. 917—923。

得在元朝官场和社会流动的能力。不过,与那些逃往宋朝控制的东南地区的同乡相比,陈吉甫、何坤章和蒲道源有一个重要优势:通过投靠蒙古人并为元政府服务,兴元的移民能够在新的精英阶层形成以前为自己找到位置;他们能够享受较早归附元廷的果实。而前往东南地区的四川流徙精英则面临更加严峻的障碍。在这里,旧有的秩序相对完好,穷困潦倒的流亡者不可能通过金钱回到精英社会。此外,元代的地主比以前更加强大,留给那些新移民的社会空间非常小^①。

新移民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因为元代直到1315年才有常规的科举考试。根据元的种族分化制度,大约三分之一的官职留给了色目人,剩余部分大部分给了北方汉人。这使进入政府的途径更加复杂。只有一小部分的职位可以被那些政治上有污点的南人得到,从而使竞争白热化。由于没有科举考试,对南人来说最可靠的进入官场的途径是靠元廷官员的举荐。据韩明士的说法,这往往需要当地有影响人物的大力推荐^②。鉴于南方地方精英求官的人数量巨大,这些被赶出家园的四川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那么,在经历蒙古人战争之后,这些曾经得意一时的四川士大夫精英的幸存者是如何重新在东南地区这个狭小的社会和政治舞台获得权力和影响的呢?对那些流徙中的四川人而言,是什么使他们的田产和地方联系得以恢复?对他们而言只有一种可能:他们能够利用曾经是受人尊敬的士大夫一员时所获得的声望和学识。那些在流徙中成功进入东南地区元朝精英层的四川人具有强烈的学术传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这些特点使他们和他们子女引起在本地、本地区或全国有影响举荐人的注意。在东南地区,四川流徙精英被看成是士大夫价值观和自我身份的典型,成为被袁采称为“吾辈”的最好代表,从而最后被吸收进通常

①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重印,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8—25页。

② 韩明士《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107页;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重印于《宋史研究集》,15卷(台北“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227—289页,特别是251—252页。对于《元典章》卷7种族分化制度崩溃的分析,参看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Elizabeth Endicott—West, *Mongolian Rule in China: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13—14页。有关许多试图通过举荐获得小官职的汉人,参看劳延焯《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兰德彰编(Yan—shuan Lao, “Southern Chinese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Early Yuan China: Some Primary Remarks”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110—113页。

被当地关系所控制的系统中^①。由于有身份团体的作用,东南地区的士大夫阶层的成员将空间让给了来自四川的同行,使他们得以进入东南的精英阶层。

我的观点是宋末和元朝的汉人将彼此认同为士大夫,这种认同产生了有亲和力的联系。这两个观点都得到近期学术成就的充分支持。根据伊沛霞的观点,宋代人(并且,似乎有可能扩展到元人)对“士大夫”的定义是,那些“拥有、借取、阅读或著述书籍,践行古典礼仪,立志做官,和高官以及其他有权力的人来往的人”。士大夫身份的主要标准就是对儒家学术传统和做官的认同,而这些又是以教育、休闲和不从事体力劳动为先决条件。尽管没有明确的界限将士大夫和社会的其他人群区分开,伊沛霞认为,士大夫和诸如村民、平民、商人和富人彼此都认为与自己与对方不同。在伊沛霞看来,这种相互认同至关重要,是他们成为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为“社会阶级”(social class)集体成员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的阶级成员在与其他社会阶级成员交往时的行为方式,和与本阶级成员之间交往时的行为方式不同。”^②

但是,士大夫姻亲联系是否跨越了地区界限?韩明士对抚州地区精英的研究表明它没有跨越地区;因为到了南宋,韩明士研究的抚州士大夫几乎只与当地的士大夫有交往,并且至少在婚姻方面排斥外来者^③。不过,窦德士(John Dardess)认为,对元代“士”的自我形象的设计者而言,身份团体联系有可能超越地区界限。窦德士的观点是,元代有影响的思想家将“士”看成是“一个内部有分层的非常广泛的社会范畴”,既包括那些最底层的有影响而不是有学问的本地名人,又包括那些处于顶端的集士的领导才能和儒学知识于一身的儒学“专业人员”^④。窦德士证明,一些元代思想家脑海中的整个士的身份团体的内部分层是以地理为标准的:他们有的仅仅是在狭小的地方舞台发挥影响,有的在地区发挥作用,少数的几个则在全国发挥控制性的影响,他们代表了士的学问、博学和做官的最高境界。按地理等级划分士的层次首先由孟子提出。孟子曾这样写道:“一乡之善士,斯友

① 袁采《袁氏世范》(知不足斋丛书)2.18。这里,袁采从一个非常局部的角度谈论当他们从市场中走过时,他所在的阶层所面临的危险。参看伊沛霞《中国宋代的家庭和财产》258页。

② 伊沛霞《中国宋代的家庭和财产》4—5页。为此,伊沛霞所引用的熊彼特的社会阶级(social class)的概念可以被看成与韦伯的身份团体(status group)是同一概念。

③ 韩明士《官宦与乡绅:两宋时期江西抚州精英研究》52—53;72—73页。

④ 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 Professional Elit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9—24页。

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①

在窦德士提到的一封信中，移居抚州的四川人虞集全文引用了孟子的注释。但是他不但强调了同一层次士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且强调了更高层次的士对较低层次的士的变化的影响：

彼所谓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国矣，一国之士必有所居之乡矣。以天下之士一国之士而处乎一乡焉，吾不待去亲戚远坟墓而得见之，不亦幸乎？^②

为什么抛弃父母和祖坟去与天下的士结交是令人高兴的呢？因为与这些层次更高的士交往可以改变自己；它可以提升自己：“吾子得一乡之善士而友之，则吾子亦一乡之善士矣；得一国之善士而友之，则吾子亦一国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则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

虞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道，由于他和他的家庭跟抚州当地社会结合得非常紧密，大多数的品评人士都忽略了他的籍贯。而且他是当时的流徙人群最雄辩的代言人。或许是因为他占有了两个世界——地方士大夫和流寓士大夫的世界。我们在虞集身上看到了身份团体联系如何将两个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些丧失了财富和田产的四川流寓精英要么以“国之善士”，要么以“天下之善士”的子孙的身份艰难地闯入东南地区的精英阶层。流徙社群的成员所拥有的仅是学识和声望，但这足以让他们获得地方和全国有影响人物的注意，并被推荐担任私塾教师，政府儒学中的教育官员和文职官员。下面的例子将证明，流徙中的少数四川人是如何通过将超群才能和高出身结合起来克服难民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成功：才干、出身和援引

居于流徙社群顶端的是那些宋朝国家级的精英或是与他们交往密切的人。一旦忽必烈的儒家幕僚使皇帝相信前朝的官员应该被邀请来管理新政权和加强元朝的合法性，那些宋的“天下之善士”就能够为新政权所用。

和流徙一代联系最密切的人很可能是仁寿的牟应龙。牟应龙在祖父牟子才湖州的家中长大和接受教育。牟子才是四川著名道学倡导者、宋理宗（1225—

^① 《孟子》（台北：孔孟学会重印哈佛燕京汉学索引，第17卷，1965）5B. 8。我对刘殿爵（D. C. Lau）所译的《孟子》（*Mencius*, Middlesex, Eng.: Penguin Books Ltd., 1970）第158页译文有所修改。

^② 虞集《送危太朴序》，《道园学古录》31. 534—535。

1264年在位)的顾问魏了翁的学生^①。虞集在他给牟应龙写的墓志铭中特别强调了这段成长经历的重要性:

(子才)以直道事理宗,为时名臣。登其门者一时人望。先生皆得而亲之,丞相江公万里,参政杨公栋、高公斯得、端明汤公汉,尚书刘公克庄至。折行下之,而高公荐之尤力。^②

牟应龙1271年中了进士。由于他拒绝加入贾似道一伙,“考官……不敢置上第,调光州定城尉”。宋亡后,前宋臣刘梦炎邀牟应龙到在忽必烈的翰林院任职。“先生不答留,尚书愧之。既而家益贫。稍起,教授溧阳州。遂以上元县主簿致仕。”^③尽管非常向往隐士的清白,牟应龙被迫为元朝服务,因为他的家庭享有很高的声望,做官的机会是现成的。

早熟的张昞的例子则进一步证明,身份集团和同乡联系非常重要。4岁时,张就被父亲引见给了儒学名家李心传(四川人)和真德秀,两人都称他为神童^④。16岁时,张的父亲去世。在此后的四年中,他的母亲教授他诗赋,成绩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因为大约在1256年,他参加了专门为四川流亡人士举行的蜀士流寓试,失败。此后,他很迷茫,不知道该学什么。正在此时,他的同乡和政治家杨栋指导他根据“义理之学”学习理学。杨栋此刻的帮助非常关键,因为张应试失败后仅能由自己的母亲保护,很可能就此从众人的视野消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杨栋注意到张,但我们可以猜想张家的名望和母亲的黎姓出身起了一定作用^⑤。杨栋将时27岁的张带至“金华四子”之一、传播朱熹思想的重要人物王柏处学习理学典籍^⑥。利用他和杨栋的关系,张昞得以进入杨的家乡台州的学术圈并自由进入都城的翰林院图书馆,对理学典籍“究极根柢”。到了13世纪70年代,张的学术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助,并赢得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的声誉。宋的灭亡很

① 《宋史》#11. 123555—123561;《宋元学案》(台北:正中书局,1970)73. 925。

② 虞集《牟伯诚墓碑》,《道园学古录》,15. 260。

③ 虞集《牟伯诚墓碑》,《道园学古录》,15. 261。

④ 吴澄《张君墓碣铭》,《吴文正集》,73. 13b。吴澄使用真德秀的号“西山真公”,但是要么存在年代错误要么是张冠李戴,因为真德秀已经在1235年死了。

⑤ 有关作为雍康大族之一的张氏家族的证明,参看费著《氏族谱》,《全蜀艺文志》(1889年,雨余山房编)55. 3b。黎姓四川名人,包括《朱子语类》的编者、理学家黎靖德的简要传记,参看许肇鼎编《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成都:巴蜀书社,1986)。

⑥ 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金华政治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兰德彰编(John D. Langlois, Jr.,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150—151页。

快使他的个人和学术资本面临考验。根据他的友人和主要的传记作者吴澄(1249—1333)的记载:大约在1276年,“天兵南来,家歼焉。君茕然一身。”^①张被迫靠教授学生养活自己,并再次面临湮灭无名的危险。但是,他的学术声望引起了当地士大夫和元朝官员的注意。大约在1280年,一位行省官员听说了张的名气,邀请他到江宁(南京)做学官。根据《元史》中张的传记的记载,他在那里起到导师和道德模范的角色:“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书》者,皆遣从逕游,或辟私塾迎之。”^②汉族和色目人高官的接二连三的推荐使张逕以建康路(江宁县)儒学教授的身份“入流”,并随后在北京担任孔子、孟子和颜渊“三氏子孙教授”^③。张戴上了“天下之士”的光环。正如吴澄所陈述的,在他快要结束教授任期的时候,山东陞城的士大夫“迎致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学徒自远而至者日富”。张以疾病为由拒绝了让他前往国子学的任职,退居江宁下游的仪真。在那里他得到江东宣慰使沙卜珠的赡养。半个世纪后的1354年,真州守臣为三位曾在仪真居留的大学者郝经(宋末被贾似道流放到此)、吴澄和张逕建祠^④。

父亲和母亲所在家族的声望也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虞集和虞槃兄弟才能的注意。虞氏和杨氏都是唐代入川,两家在宋末都出过高官(包括宰辅)。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虞汲是1270年被岳父杨文仲从四川带到衡州。1287年,他移居妹妹在江西崇仁的新家。在那里他和当时因为是“元朝重要的经典学者和理学家”而声名鹊起的吴澄为好友^⑤。

两兄弟出生时,虞家还在流徙中。他们的母亲为他们作了初步指导。母亲曾向她的父亲杨文仲和她的堂兄弟宰辅杨栋学习。到达崇仁后,兄弟俩青少年时师从吴澄,并“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⑥。他们无疑非常有天赋,不过更让人无可

① 吴澄《张君墓碣铭》,《吴文正集》,73. 14a。张的传记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吴澄的墓碣铭和《元史》,189: 4315—4316。

② 《元史》,189: 4315。

③ 吴澄《吴文正集》,73. 14。有关教育机构对求仕南方汉人的重要性,参看劳延焯《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107—134页。有关元朝官方学校体制和法定的升迁途径,参看《元史》81. 2032—2033。

④ 《吴文正集》,73. 14b—15a;《元史》,189. 4315—4316。

⑤ 葛德卫《吴澄和元古典传统的保存》(David Gedalecia, “Wu Ch'eng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 in the Yuan,”)见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第186页。虞集和他的家族传记的基本资料是《元史》,181:4174—4183;虞集《亡弟嘉鱼大夫》,《道园学古录》,43:724—727;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9. 23a—34b;赵汭《邵庵先生虞公行状》,《东山存稿》6. 1a—26b。

⑥ 《元史》,181:4174。

置疑的是他们出身很好,因而他们的才能得到人们的重视:“时人已叹其识……时人美其才,稍从诸侯为宾客。”虞槃被举荐担任一系列的教育官职。1318年考取进士后,他转到地方政府^①。虞集也得到有影响人物的帮助。他被邀请到元将董士选(1253—1321)开办的私塾教书,和他一起享受这一荣誉的至少还有两名有前途的学者范梈和吴澄^②。1297年,虞集“以大臣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他显赫却又让他极度灰心的当皇帝顾问的生涯,被迫通过蒙古语翻译传授治道和为元取代宋编造儒家的正统性^③。

身份团体的联系甚至对那些出身不是很高的家庭也很重要。谢端在“元世蜀士以文名者”中仅次于虞集。他得益于他出身于遂州涪江镇长期享有儒家声誉的谢家^④。尽管谢家在宋末并没有什么人做官,但是谢端的祖父在1240年代逃亡到江陵时,因“深通玄象,发言惊人”而出名,并受到孟珙的礼遇^⑤。因此,尽管谢氏并不属于蜀地精英的上层,他们的名气足以使他们将自己的儿子置身于科举和举荐的网络中。10岁时,谢端开始在江陵练习写科举考试的文章,并“屡出同舍生上”。弱冠后,他成为程朱理学“性理之学”的倡导者、理学家王奎文的弟子。谢端与父亲在江陵做官的大都青年宋本为友,接受王奎文的指导。这两个小孩聪明无比,“时号谢宋”^⑥。他们的声望和与官场的联系就此建立。在13世纪末,在得到两位父亲在元政府中担任相当高官职的南人的援引后,谢端更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约在1298年,荆南宣慰史杠“数加延礼”,并将他推荐给著名的散文家姚燧。姚燧的舅舅姚枢是将理学推广到元朝的最主要的人物^⑦。姚燧惊诧于谢端的才能,推荐他获得茂才功名,并担任教职。直到1318年考取进士之后,谢端

① 虞集《亡弟嘉鱼大夫》,《道园学古录》43:725。显然,即使过了三十年,虞氏家族的人仍被看成是四川人,因为虞槃之所以被允许作为一个江西的居民参加考试是“因为四川的路程”。

② 《元史》,181:4174。

③ 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9. 25b。有关虞集的政治生涯,参看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护教者的学者》,《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8第1期(1978):99—116页。(John D. Langlois, Jr., “Yu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 The Scholar as Apologist,” JAS)

④ 《元史》,182. 4206—4207;苏天爵《谢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13. 501—510。

⑤ 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3。谢端的母亲和祖母都是来自牟氏家族,很可能是与仁寿牟氏并行的一房。

⑥ 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4。

⑦ 《元史》,182. 4206;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3。有关姚枢将理学推广到元廷,参看狄百瑞《理学和心学》(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22页。有关姚燧1298年在江陵的事情,参看《牧庵集》“附录”中他的年谱,第10页。谢端的妻子史氏,可能是史杠的一个女儿:《滋溪文稿》,13. 503。

才开始仕途;随后作为新一代的科举学生,他在湖南成为一个堪称楷模的地方官员;在翰林院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学者,当时重要的历史、行政和礼仪文件多出自他之手^①。才能和社会地位是谢端家族作为“国之善士”身份的遗产。它使谢端能够得到在全国有影响人士的帮助。

即使无法接近那些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士,流寓精英仍可通过引起地方士大夫精英的注意而将他们士的身份和文化素养转化成升迁动力。这对那些强调将(个人)修身和做官与学问结合起来的理学运动的倡导者尤其如此。理学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在12世纪开始兴盛起来,特别是由于朱熹和他的弟子(包括许多四川人)的“福音主义者式”的活动。在慈善事业方面,南宋的理学运动促进了各种新志愿性组织,如“乡约”、义仓,特别是书院的产生。在书院,那些有超凡魅力的道学大师教授专心致志的弟子和那些自身也受益于这种组织的地方精英的子弟。

理学倡导者并不排斥做官,并常常将它看成是宣扬改革的机会和职责。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立场从不打折扣,他们经常被罢官或贬到没有权力的闲职。此外,到12、13世纪,官职已经很难求得,但做学问并不难:参与学术和理学运动能够使一个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可以控制和预见的)地方层面上得到认同。随着宋朝被一个外族和起初敌视汉族文化价值的政权所征服,理学观念在为地方汉族精英找回自尊方面作了很大贡献;理学对道德和文化复兴发挥了“草根运动”的作用^②。在变化和不安定的环境下,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受到了威胁,地方精英很可能会求助于那些客居在当地的士的精英来加强自己的身份和幸福感,因为这些人 是汉族道德、文化和学术的楷模。那些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有可能成为那些尽管背井离乡却在文化上非常有影响的文人的赞助人。那么,地方精英是如何帮助那些客居的士升入官僚网的呢?韩明士和其他人指出,由于那些元朝的地方官员一般都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往往都向这些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求助,推荐一些官职的人选^③。官员们能够知道那些定居当地的精英,却不能认识那些刚来不久或移居当地的人。我们从邓文原、刘渊和他儿子刘彭寿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当地精英的称赞能够使流徙的士大夫获得官职。

邓氏家族似乎是唐末随移民进入四川的,一直定居眉州,直到蒙古人的入川

① 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5。

② 有关理学对元代思想家的吸引力,参看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一部分。

③ 韩明士《宋元时期抚州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111页。

将邓文原的父亲赶到南宋都城杭州^①。和他的许多同乡一样,邓文原小时候就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在1274年浙西举行的流寓试中领先于所有其他四川试子^②。他的成功本可以使他通过进士试,但宋的灭亡使之成为泡影。据邓文原的朋友吴澄记载,“逮南服归国,市隐弗耀,训授生徒以给亲养。”^③邓文原用放弃科举考试的方式来纪念让他遭受巨大创伤的宋亡。用儒学领袖黄溍(1277—1357)的话说,“(邓)遂一意务为圣贤之学,行益修,业益茂。开门授徒,门屡常满,中州士大夫多慕而与之交。”^④邓文原在当地精英中的名气使他得以接近和结交元朝有影响的官员。这其中包括以向朝廷推荐合格人才著称的色目人高克恭(1248—1310)^⑤。1290年,一位有影响的官员任命邓文原为杭州儒学正。这是邓在都城和其他省长达35年在教育、行政和学术方面任职的开始。在他死后的1349年,他的弟子冯思温成为大学士,邓文原被封爵^⑥。

眉州刘氏的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与他们流寓的湖南衡山的地方精英关心公益和拥有自豪感有密切关系。据族谱记载,刘氏家族是隋代入川。后蜀开始有人做官。宋代时,专门在四川做官和从事经学特别是《春秋》的研究^⑦。1252年刘彭寿的祖父从四川逃到湖南不久后死去。刘渊的父亲似乎是和他的家庭分开逃出来的,在最后辗转到湖南前曾在北方漂泊。刘渊和家人定居在湘江流域的衡阳。根据著名的文人欧阳玄的记载,他因“卓行笃学,为士楷模,事母至孝”而受到欢迎^⑧。刘渊因学术和“耆年修子,职尤谨,用荐为”衡州西南的永州路学正。这时,刘渊年事已高,辞官后收授弟子。

刘渊的成功为认真而有才干的儿子创造了条件,他被任命为位于下游的、邻

① 邓氏从资州移居眉州,具有唐代入川时的所有特征:与四川三大姓杨、游和谢有亲缘关系,从长安迁来。参看黄溍《邓公神道碑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26. 267—270。

② 很多四川流民被称为神童。例如,赵沔《黄楚望先生行状》(《东山存稿》,7. 5b—6b)中的黄泽的传记,虞集《林彦粟墓志铭》(《道园学古录》,18. 310—311)中的林宽。

③ 吴澄《邓公神道碑》,《吴文正集》64. 21b。也可参看黄溍《邓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26. 268和《元史》,172. 4023—4025。有关流寓试,参看贾志扬,《宋代学术的荆棘之门:科举考试的社会史》(John 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0—102页。

④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26. 268。有关黄溍在元代儒学的地位,参看窦德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第265页。

⑤ 劳延焯《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第111页。

⑥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26. 269。

⑦ 欧阳玄《刘公墓志铭》,《圭斋集》,10. 33a—36b,特别是34a和35b。

⑧ 欧阳玄《圭斋集》,10. 34a—b。

近衡州的衡山县教谕。刘渊和儿子一起赴任，家境贫穷。据欧阳玄记载，尽管有些夸张，但看来还够吃，“公以薄俸迎养怡然。”尽管如此，由于父子俩在衡山掀起了一次文化复兴，“衡山士习之美，遂留居焉。”刘彭寿随后被任命为衡阳西部武功路儒学正。1314年考取元朝第一批进士后，刘彭寿被调任地方官职。不过，使他日后留名的还是当老师，他培养了许多取得功名的人和官员。正是由于他和他父亲，衡山才形成了一个以文人精英为特征和受人尊敬的新形象。他们对衡山的影响得到了刘彭寿的弟子、衡州路推官何克明请欧阳玄写的碑文的赞扬：

衡山为邑，自武夷胡氏广汉张氏寓居是邦，学者宗之凛然一趋于正。从是百余年，眉阳刘公父子寔来，使告邑人弟私淑胡张二先生之训。久而弥章，则其薰陶启迪之助居多。今不幸即世，母老孙幼，至以身后属其一二门人。门人愿以不朽托公之同年，惟先生义而铭之，庶几公犹未死也。^①

仕途和家族未来

大多数汉人的最终目标与其说是个人发展，还不如说是整个家族的长期的兴盛。不过，再有远见的家族政策也可能被灾难所破坏。例如，当刘彭寿孙子成为孤儿后，由祖父的弟子照看：刘彭寿的儿子刘侣早逝（大约1335年）。刘彭寿伤心欲绝，在将孙子托付给弟子照看之后，也于当年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时代和阶级背景下，刘彭寿尽其所能地确保家族的未来：他教育儿子刘侣，并在他通过乡试之后，为他提供通过恩荫进入仕途的机会^②。尽管对大多数更加安定的东南地区的士绅而言，做官只是地方升迁政策的一个次要部分，而从四川逃亡出来的精英则把做官当成个人成功和家庭扎根异乡的关键。他们对仕途的倚赖很可能使他们付出感情代价。正如牟复礼30年前所指出的，以道德原因（自发的隐居）或出于对已经灭亡的宋朝的忠诚而拒绝在元朝做官，对许多南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立场^③。我们甚至能够想象那些被蒙古人毁灭家园的流亡的四川士大夫有强烈的动机拒绝加入到元政府中。

大多数的四川文人拒绝接受其他士大夫得自田产的收入，认为做官是养活自

^① 欧阳玄：《圭斋集》，10. 33ba—34a。有关衡山人对南宋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四川人张君的敬仰，参看祝穆《方輿胜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孔氏岳雪楼钞本）23. 523—524。

^② 刘侣因为朝廷给予父亲的恩惠而被任命为衡州路的儒学正，死前刚被提升为教授。参看欧阳玄：《圭斋集》，10. 35a。

^③ 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己和家人的唯一途径。神童和理学正统学派的信奉者四川人黄泽曾试图在不做官的情况下过活。45岁时,在连续担任江西两个书院山长之后,黄泽完全沉迷于孔子的说教,于是“闭门教授以养亲^①”。有段时间,他和家人得到九江一位赞助者的慷慨的资助。但是在他60多岁时,这种被狄百瑞称为“类似偏执狂的”预言式的儒家思想开始毁灭黄泽。他渐渐开始迷信绝食、不睡觉和贫困。由于黄泽身体变得越来越弱,不能教学,他的家人陷入贫困和饥饿。尽管黄泽一直活到了87岁,他的弟子赵沅(1319—1369)这样评论:“昔所闻儒学之士贫,屡空乏以终其身未有若斯甚者。”^②

劳延焯将黄泽作为坚持远离积极的公众生活的南方汉人的典型^③。但是大多数徘徊于政治道德和家庭义务之间的四川人拒绝以黄泽为榜样。即使是地位相当不错的牟氏家族也迫于环境压力不得不牺牲道德而采取务实做法。南宋灭亡后,牟应龙的父亲辞去了政府的差事,应龙试图以父亲为榜样。但是,他的传记作者虞集这样解释:“既而家益贫。稍起,教授溧阳州。遂以上元县主簿致仕。”^④同样是望族的虞氏家人也被迫做官,因为正如虞集这样写自己和弟弟:“吾二人者,虽志不在仕宦,而贫无以为家。”^⑤

许多流亡四川人对宋的忠心由于宋朝事实上将四川让给蒙古人而削弱,即使曾在宋朝做过官,他们对为元朝服务不再迟疑^⑥。成为难民的四川人不仅很快接受了蒙古政权,而且升迁到特别高的位置。正如劳延焯所证明的,尽管在获得教育方面官职之后,往往要过上多年才能成为有品秩的官员,并且如果按照规定的提升速度,很少有人有希望成为县丞,更不用说成为路或朝廷官员了^⑦。从这个

① 赵沅《黄楚望先生行状》,《东山存稿》7.6a《元史》,189.4323。

② 赵沅《东山存稿》7.6b—7b。他的家庭因为黄的两个儿子早逝而更加悲苦。有关元代理学思想中的“极度虔诚和类似妄想狂的作风”,参看狄百瑞《理学和心学》(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and-Heart*),13—17页。

③ 劳延焯《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第122页。

④ 虞集《牟伯诚墓碑》,《道园学古录》,15.260—262《元史》,190.4338。

⑤ 虞集《亡弟嘉鱼大夫》,《道园学古录》43.726。在父亲虞汲赎回10位在都城劫为人质的族人之后,虞家首次陷入财政上的困难。但在他担任教授后,他们的境况有所好转。参看《元史》,181:4174。

⑥ 在两朝都做过官的人除了虞汲,还包括林宽的父亲和青阳梦炎。参看《道园学古录》,18.310—311;袁桷《清容居士集》33.8a。张惠1236年被蒙古人扣为人质后,成为蒙古朝廷的顾问,包括忽必烈的;参看《元史》,167。资州的谢昌元尽管悲叹“非常悲剧性的”四川被毁,却在元朝担任礼部尚书;参看《清容居士集》33.8a。

⑦ 参看劳延焯《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第112页的评论和资料。劳延焯的解释是,资料表明做过一任州或府的教授的人的品秩是九上。参看《元史》,91.2316和注释13,第2326页。

标准来说,流亡的四川人的确是成功的。在仕途可以追溯的36人中,四人拒绝做官^①,三人做过书院山长^②,六人留在地方和路的教育系统中,五人成为有品秩的官员^③。在剩余的23人中,八人在县、州和路做过官^④,三人升任路总管^⑤,三人担任重要的行省官职^⑥,九人在朝廷做官(主要是在翰林院)时扬名。^⑦

仅仅靠数字并不能表达官员身份对流亡四川人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地方层面。在元代社会,市民文化的色彩非常淡薄,地方的人们很容易遭到威胁和胁迫。那些具有最好的士大夫学术传统和注重仁慈和公正的治国才能的流徙四川人,能够抵抗险恶的社会动荡。虞槃将这些品质带到了湖南湘乡。“仲常之治湘乡也,问官多自进士出,敏于为官。”^⑧在揭露一位有钱的凶手嫁祸于“受役于己者”之后,虞槃又得到了当地人要求惩处一名自称“神降”的巫者的请求,因为这名巫师预言将发生多起令人不安的大火,并通过巫术吓倒了湘乡的胥吏和长官。甚至在虞槃已经揭露出此人是个骗子和纵火犯之后,当地官吏仍不敢对他使用笞刑。虞槃了结了这个案子并将这名巫师和他的同伙送回他们的村子。此后,“官府民家以安,始服儒者之为政如此。”^⑨

尽管元朝的提升机会非常有限,在地方显著的政绩还是可以带来升迁。如果不是他1327年死于中暑,虞槃很可能和他的哥哥虞集一样到朝廷做官。邓文原在地方的成绩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最后将邓从府教授提升为重要的翰林^⑩。1318

① 牟巘,何德之,游汶和师世美。

② 黄泽和王氏两兄弟。

③ 陈吉甫、何坤章、王元明、刘渊、史圭文和史景星。只有史景星的职位浙东帅府录可能没有品秩;参看《道园学古录》5. 95和20. 338。尽管被任命为平江路教授,史圭文在到任前就死去。

④ 牟应龙、王立中、林宽、虞槃、刘彭寿、李德成、史孝祥的儿子和史绳武。

⑤ 杨公畿,他的儿子杨壮行和王立中的曾祖父。后者的任职地点和官衔——平江路总管府事几乎肯定是元而不是宋的官名;参看张景春《吴中人物志》(1570年,扬州:扬州古旧书店影印,未注明出版日期),7. 24b。

⑥ 邓文原和刘宗说都担任过肃政廉访司;杜敏1338年被任命到云南担任同样的官职,但可能应该是晚一辈。参看《四川志》(1518),19. 17b。

⑦ 张惠、张翌,谢昌元(吏部尚书)、青阳梦炎(也是吏部尚书)、虞汲、他的儿子虞集、谢端、宇文公凉和蒲道源。

⑧ 虞集《亡弟嘉鱼大夫》,《道园学古录》43. 726。

⑨ 《道园学古录》43. 726。

⑩ 这个评论来自黄溍《邓公神道碑铭》,《金华黄先生文集》26. 269。自担任杭州儒学正之后(1290年)邓文原在行省和朝廷的学术官职中长达了35年。

到1323年,在他担任江南东西路肃政廉访司使期间,以“人以为神”^①的勇气和技巧亲自调查谋杀、诽谤、伪造和囤积粮食行为,赢得了匡扶正义的美名。谢端也通过熟练的侦查和迫使桀骜不驯的官员行动升到上层。谢端和虞槃一样是1318年的进士,“于是人材辈出,以文学政事著于世。”^②时任长沙附近湘阴州同知的谢端迫使属下官吏起诉一位抢走别人妻子,本以为可以免于惩罚的土豪。谢端最后恢复这名妇女自由并将这个恶霸赶出自己的辖区。他还起诉了一名杀害商人的凶手,从而揭露了一对杀人夫妇在自己家的水井里隐藏4具尸体和在自己房梁上藏着脏物的案件。当地官员曾拒绝对他进行调查。根据他的传记作者苏天爵的叙述,谢端的断案能力是如此敏锐,“或他州讼狱弗能决者,亦檄公治之,公去湘阴二十余年,民犹颂其遗爱。”^③

谢端从地方调往朝廷的学术机构中任职了很长时间,最后被调到他的同乡虞集所在的奎章阁^④。兰德彰通过虞集的例子证明,在蒙古政权下,做高官对汉族学者来说可能是沮丧的,因为往往得不到制定政策或改变事态的实权。不管谢端本人是否对自己毫无权力感到失望,他的元代的传记作者,可能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了对谢端能不能被更好利用的愤懑:

公湘阴之政所试者小,而人已受其慧若见诸大用,当如何哉!欧阳公玄志公之墓谓,公材器宜居言官。处政途世不用不极为恨,盖犹愈于既用而触人望者也。呜呼,士有抱负艺能而不克尽施于用者,岂独公乎!^⑤

每当活下来的四川士大夫回想过去,他们不可避免地为自己失去的世界而忧伤。尽管做官可以养活自己和为纠正自己的冤屈提供有限的机会,但是这些士大夫没有实权,他们服务的政府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不管他们多么关注将来,他们的家庭和故土已经被毁。作为他们最成功的成员,虞集通过会见同乡,参考他们的族谱,为他们书写讣文不断地反省过去,保持蜀人的集体记忆。他的反思常常带着忧郁。在沉思完自己弟弟虞槃的死后,他不禁为那些曾经为政府服务的宋

① 黄溥的墓志铭参看《元史》,172. 4023—4025。《吴文正集》(64. 21a—24a)中吴澄的墓志铭有关邓的经历非常少。

② 苏天爵《谢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13. 502。

③ 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6—508。

④ 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护教者的学者》(Langlois, “Yü Chi and His Mongol Sovereign”),《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8 第1期(1978):第106页。据说图帖睦尔(文宗)曾告诉一名顾问,“当今文学之士,朕惟知谢端。”1332年,“文宗崩,竟不及用谢端”;看《元史》,182. 4207。

⑤ 苏天爵《滋溪文稿》,13. 508—509。

代大家族的消亡而悲伤：“嗟夫！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矣，而遗经道学之传尤鲜焉。”^①

虞集以自己生活的圈子——聚居在眉州和附近仁寿县的儒学大家为例，寻找自宋至今发生了多大变化的证据。以曾经有好几百房的眉州史氏为例：

其他以儒学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间多不及数，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

呜呼！以数千百房之子孙，而某所知者仅若此，不亦悲夫！^②

对史氏家族的这些反思使虞集为自己母亲的家族、眉州杨氏的杨仲文那一房的命运悲伤。尽管他们曾有出过学者和官员的光荣历史，而此刻他们已经破落到只有一个男性后代的境地，被迫寄居于江西的虞氏兄弟家。虞集的沮丧警告我们不应该夸大少数生存下来的人的成功：他们代表的是那些零散的大浩劫的幸存者，他们在悲惨的环境中坚持生活，他们坚持在其中做官的政权正是那个曾经毁灭他们家乡的政权。

和过去的荣耀相比，在元政权下做官可能看起来令人感到灰心和忧伤，但是，做官可以使流亡者保留在精英阶层中，为他们的子女铺路。对那些没有什么田产和财产留给子孙的流寓家族而言，做官是保障家族未来的最可靠的方式。这是因为做官可以为保持家庭兴盛提供两大重要优势：流徙的儿子通过恩荫进入仕途，流徙的女儿可以与官僚缔结好的联姻。萧启庆指出，恩荫允许一定品秩的官员推荐家庭成员做官。这在元代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根据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最近翻译的元代恩荫的主要文献，很显然在南方，所有品秩七品或以上的文官——实际上我们抽样的所有流亡官员——都可以推荐一个儿子做官^③。

并不是所有流徙精英的儿子（我在此指的是元政权下出生的第一代）都需要恩荫来获取官职。移居长沙并先后在淮东、广西、江东和江西任监察御使和肃政廉访司使而博得名声的刘宗说将三个儿子送到地方做官，但他显然没有利用这种恩荫制度^④。但相当数目的人还是利用了这个特权。我们取样的流寓四川人中已知 18 人有儿子，12 人将儿子送去做官，其中 8 人，包括著名的文人邓文原、虞集

① 虞集《亡弟嘉鱼大夫仲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43. 727。

② 虞集《题史秉文资阳故谱序》，《道园学古录》5. 95。

③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第 251 页；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65—74 页。

④ 欧阳玄《刘公墓碑铭》，《圭斋集》10. 4a—b。

和谢端,借助了恩荫^①。在我们所用的主要的文献编写的时候,这些人的儿子还都在府县做官,在元朝开始崩溃以前他们不太可能成为高官。不过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流亡家庭已经开始利用蒙古人对世袭官僚的偏好(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认为,世袭官僚因为任意扩大荫恩而成为制度),以在地方和省一级行政机构做官为业,就像他们南宋时期的先人专门在中央政府做官一样。

在利用元政权的新制度的同时,流亡的四川精英运用自己较高社会地位、士大夫联系和非凡的才能在元代的官僚体系中升迁得比大多数南方汉人更快。这些流亡人士利用他们在仕途上的成功为他们的儿子在地方的官僚系统中又留得一席之地。对那些四川大浩劫中的幸存者,在元廷做官是保持他们精英阶层身份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流亡的四川人的流动(升迁)策略的目标仅仅是争取在元代官僚体系中几代做官。毫无疑问,郝若贝和韩明士所证明的南宋社会地位流动方式,即以建立和加强地方权力位中心,得到了流徙精英(他们可能已经成为地方权力的经纪人牺牲者)的重视,终于使强有力的地方地位成为他们的目标。但是作为新地域的寄居者,他们不得利用自己的每一个优势;从短期看,他们的优势在于利用做官的机会。

流寓中的四川人尽可能地发展地方上的联系。例如,在那些像湖南慈利州这样不够发达的地区,四川流徙者能够很容易跻身正在形成的地方精英。但是,其他的流徙社群的联姻方式表明人们在选择新娘时往往权衡地方联系和籍贯联系。在13例发生在移居后且妻子的名字能够被知道的婚姻中,我可以确定其中6例的地理来源。三位流徙者娶了其他四川移民的女儿:蒲道源娶了他老师的女儿何氏,牟应龙娶了两位眉山显赫的女人,张翌的第二个妻子是他的堂(表)妹。两人娶了当地的女子:杨壮行娶了一位庐陵女子,虞槃娶了他父亲妹妹的女儿,邻近宜黄县姓谭的家族^②。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乡间的联姻逐渐减少。和虞氏一样同为抚州崇仁县移民的师世美的两桩婚姻即使不能证明,却也许能够用来说明四川人间的联系对那些流亡人士的儿子吸引力不断下降。师的第一个妻子是最早流徙到崇仁的四川人陈元晋和妻子虞氏(虞汲的姨妈)的孙女儿^③。陈氏死后,师世美却选取了邻县乐安的一位黄姓的当地女子。

① 为他们的儿子使用荫的包括邓文原、刘彭寿、史孝祥、王立中的父亲、谢端、杨公畿为他的儿子壮行,壮行为他的儿子昌文(音译 Changwen) 虞集。

② 有关这桩婚姻和虞氏在撮合抚州婚姻中的作用,参看韩明士《宋元时期抚州的婚姻、血缘集团和地方主义策略》,111—112页。

③ 吴澄《将仕郎师济叔墓志铭》,《吴文正集》,72. 6a;欧阳玄《虞雍公神道碑》,《圭斋集》9. 24a。

师世美是为数不多的被拒绝在仕途之外的流寓四川人,与此相反,他的婚姻关系和韩明士所证明的其他抚州精英的地方倾向方式非常相似。我们不知道师的儿子娶了什么人,但是师将两个女儿嫁给了相对来说是本地的家族:一个是崇仁县的男子,一个是来自该县西北的南昌府(豫章)的男子^①。湖州的史圭文的女儿也“皆适令族”,指的是当地的家族^②。但在剩余的7位女儿的丈夫确定的流亡人士中,女婿通常都是用职位而不是籍贯称呼的。职位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女儿和非本地的人结婚:蒲道源的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了一位兴元在职的官员,而另两个嫁给了曾在兴元做官后留在该地的官员(其中有一位是陕西乾州同知)的孙子^③。但其余5人不是根据他们的籍贯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丈夫,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官员或外地士大夫身份团体的成员^④。儿女众多的长沙人刘宗说就是这样一例,他的三个儿子都在路一级做官:他的第一个女儿嫁给了江西本地的有功名的人,接下来的两个嫁给了外国人(伯颜和卜德生),第5个女儿嫁给了欧阳玄的一个亲戚。欧阳玄坚持认为,刘宗说的所有的女婿皆士族——他们都是士大夫身份团体的成员^⑤。

结 论

北宋时期,那些专注于做官的精英采取特有的“官僚流动策略”,南宋和元时的精英则采取专注于管理自己的家产和加强地方联盟的“地方主义策略”,而流寓中的四川精英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对那些流寓中的社群而言,官职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决定作用:通过做官,那些身无分文的流徙一代将士大夫的声望和才能转化成收入,并为他们的子孙谋到官职。同时,声望、才能和官职的结合使流寓社群的女儿对婚姻伙伴产生吸引力。一旦跻身于元朝的官僚阶层,只要有可能,流寓的四川精英可以为他们的女儿订立马上就可以加强自己家族与官僚世界联系的婚姻,同时加强自己与地方社会的联系。

① 吴澄《吴文正集》,72. 6a。

② 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道园学古录》20. 338。

③ 蒲道源《何氏宜人墓铭》,《闲居丛稿》26. 1007—1010。何坤章的女儿理所当然嫁给了蒲道源。

④ 邓文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书院的山长和当地的司徒掾史;牟应龙的女儿嫁给了路教授和路知事;虞槃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袁州同知(抚州向东还隔两个州),另一个的丈夫,虽然有名字,但身份不能确定;张翌的女儿嫁给的都是北方人,其中一个是他的弟子。

⑤ 欧阳玄《圭斋集》,10. 4b。

迄今,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流徙社群是否最终成为地方上流阶层的持久成员,减少他们对地方官僚联系(它在元明之际变得更加不稳定)的倚赖,和采取韩明士所确定的抚州地区的“地方主义策略”。不过,他们中的确没有人再回到四川的家乡。少数还留在四川的旧有的精英家族在元朝崩溃和1368年明朝崛起的过程中消失在世人的视线中。到14世纪末,唐宋时期在四川形成的士大夫阶层被一股持续的、特别是来自湖广的新移民所代替,这些新移民包括士兵、叛乱者、难民和叛乱的夏和初明政权的官员。这些新移民在四五代之内仍不为人知,直到15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以官员和文人身份成为四川新士大夫精英。正是这些来自东南地区的移民成为明清时期四川新精英的基础,他们很多人将知名度保持到20世纪^①。他们在唐宋精英被迫离开之后进入四川,构成了四川人口大交流和蒙古人入川的长期遗产。

原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2 第 1 期,1992 年 12 月

喻满意 译

^① 有关明玉珍(1331—1366年)1359年攻占四川后建立的夏国,参看《明代人物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69—1073 页中窦德士有关它的建立者的条目。有关元到清四川精英形成的各个阶段的最简洁的情况是胡昭曦《张献忠屠蜀改辨兼析湖广填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大量有关明代中期四川精英阶层形成的材料可以从《四川通志·传 44—47》中有关碑铭的部分和清代方志的族谱部分找到。许多元末明初的移民称他们的出生地为湖北麻城县,而清初进入四川的移民也这么说。我研究过麻城的几种方志,并与胡昭曦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找到麻城与进入四川的移民之间联系的完全解释。